



永不休止的文學生命力

從《文壇》穆中南的故事說起

封德屏 ◎ 《文訊雜誌》總編輯

◆ 前言

2003年7月，筆者工作的《文訊雜誌》，為慶祝創刊20周年策劃了「臺灣文學雜誌展」，在為此次展覽編印的《台灣文學雜誌展覽目錄》中顯示，五〇年代（1950 - 1959）和六〇年代（1960 - 1969）創刊的文學雜誌，共計131種。雖然有些雜誌兩三期、一年半載就停刊的，但其中也不乏像《野風》、《幼獅文藝》、《文壇》、《傳記文學》、《小說創作》、《台灣文藝》，以及《創世紀》、《藍星》、《葡萄園》、《笠》、《秋水》等創辦超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雜誌及詩刊。

造成當時文學雜誌興盛的景況，除了雜誌本身，較之報紙副刊，具有更大的容納空間，它的文學專業更吸引有文化素養、有社會地位的文人雅士聚集與發表，相較文學書籍，更可展現不同的書寫風貌及多元眾聲外，彼時的政治及社會環境，應該也是直接或間接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

1954年至1987年長達34年的報禁，在限證、限張、限制報社不得任意遷移的諸多限制下，一批過去在戰前有辦報、編報、寫作經驗的人，將他們的專長、興趣轉移到離政治現實相對較遠的文學雜誌上，因而出現了五〇年代雜誌的風潮，似乎也是說得過去的。

在文學傳播的過程中，「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的嚴酷考驗，在各個階段都可以有合理的解釋，市場的容納是讀者（被傳播者）的認可與接受，自由經濟的自然淘汰，當然也相當程度的考驗著五〇、六〇年代蜂擁創刊的文學雜誌。如果我們先將同人性質較強、發行情、市場性較弱的詩刊扣除，再將屬於文化、思想、政論的綜合性雜誌，放在一邊，創刊於五〇年代、刊期超過十年的純文藝雜誌就只剩下《野風》（1950 - 1965）、《文壇》（1952 - 1985）、《皇冠》（1954 -）、《幼獅文藝》（1954 -）四種雜誌了。《皇冠》、《幼獅文藝》目前尚在發行，影響力還待持續觀察。《野風》已有施君蘭、林佳惠兩本碩士論文專論，相較之下，刊期長達34年的《文壇》，除了應鳳凰教授在1985年於《文訊》發表的〈文壇社與穆中南〉外，其餘的只有零星的、簡短的訪問及討論了。

刊期跨越五〇、六〇、七〇、八〇四個世代的《文壇》，穆中南三個字也和這個刊物分不開。穆中南除一手創辦《文壇》外，還出版叢書、經營文藝函授學校，以一介文人之力，近三十年的時間，持續在文學、出版、教育各個面向努力堅持。是穆中南創造了屬於《文壇》的時代，還是時代造就了他？穆中南與他經營27年的《文壇》，對於臺灣文學的發展貢獻如何？

觀察《文壇》的興衰，可以反映出何種文學思潮與社會變遷？對臺灣當代作家及作品又有何影響？本文試圖通過穆中南的文藝思想、編輯理念、經營策略，將《文壇》具體成果呈現出來。

◆ 穆中南的反共文藝思想

今日探討國民黨文藝政策的論者，皆強調 1950 年 3 月成立的「文獎會」或「中國文藝協會」，以及隔年創辦的《文藝創作》月刊，鼓吹或利導文壇全面灌輸「反共抗俄」文學的意識形態，事實上，這些熱切認真響應國民黨的「反共抗俄」政策的文藝界人士，他們並非是受到壓迫而不得不表態。他們反共，除了受到亡國離鄉的切膚之痛外，有不少人在大陸時就與共產黨有交手的經驗。他們的反共意識根深蒂固，不會因為環境的改變而絲毫動搖。穆中南正是其中典型的代表，他曾說：「我一生有兩件不容商量的事，就是抗日和反共。」

穆中南生於民國元年，原籍山東省蓬萊縣。因家貧，9 歲時即離家前往黑龍江省依伯父求學，與伯父及續弦的新伯母生活，受伯母凌虐，曾有 7 天未進食的紀錄。大學就讀北平中國大學國學系，就學期間甚得校長何其鞏賞識，擢為親信。何其鞏屬西北軍，抗戰前在淪陷區代表重慶政府主政，並為當時華北六省主席蔣中立的代表。穆中南一直跟著何其鞏，除任中國大學秘書兼校友會書記長，同時在瀋陽從事敵後工作，其間還被日本憲兵逮捕入獄，出獄後曾回故鄉蓬萊縣，擔任小學校長，從事鄉村教育工作。對日抗戰開始，穆中南加入地方游擊隊，1939 年他因傷赴北平治療，又繼續協助何其鞏從事敵後工作，直到抗戰勝利。1946 年他先後擔任《和平日報》瀋陽社主筆、《瀋陽日報》主筆，並創辦文運出版社，直到 1948 年共軍勢力進入華北，穆中南才離京赴滬。1949 年 7 月，穆中南到臺北的《平言日報》報到，大陸旋即淪陷，於是他在臺灣開展另一個時期的新生活。

幼時離家，得不到父母疼愛，訓練穆中南凡事學會一個「忍」字，堅毅不拔的個性，反映在他獨力創辦《文壇》，雖幾度遭遇困難，皆咬牙度過。長大後遇提攜他的恩人何其鞏，感恩追隨，他的思想始終與國民黨的主義及政策站在一塊。抗日不必談，反共亦是終生不改。既然從黨到政，從上到下，皆認為大陸失守與文藝工作的失敗息息相關。面對「反共復國」的大業，必須從「文藝工作」的積極改變開始。全國黨政軍的配合理所當然。穆中南以一個文人作家、新聞工作者的身分獨立創辦「文壇」，響應黨的文藝政策，積極的配合宣傳，在《文壇》上多次製作專題，並在文壇函授學校上課中講話，一而再，再而三的闡述他對「文藝救國、文藝報國」的看法；似乎唯有這樣才能報效國家於萬一。1954 年 9 月第 3 卷第 1 期的《文壇》響應中國文藝協會發起的「文化清潔運動」，特製作「文化清潔運動專輯」，除刊登發起人陳紀澄、王藍、趙友培等人的文章外，並將發起經過，各媒體響應、文藝界簽名的名單全數刊登。接著，《文壇》在第 3 卷第 5 期（1955 年 2 月）開始登載「戰鬥文藝」筆談專輯。

正式大量的文章持續登載了三期，當時文壇重要作家如陳紀澄、蘇雪林、趙友培、謝冰滢、王平陵、王集叢、南郭、鍾雷、上官予、王臨泰等皆撰文表達意見。不單是製作三期專輯，穆中南還出版一套十本的「戰鬥文藝叢書」，在〈出版的話〉他說：「這次，本社一口氣



把戰鬥文藝叢書一套十本出版，在我個人來說，這不能不算一件吃重的工作。如果說真有賣房子拉債務出版文藝書的人，那麼本社就是其中的一個。」

「不顧一切的熱烈響應」確實是穆中南對國民黨文藝政策的真實寫照。

穆中南十分重視「文藝的應用性」，他似乎不單純是文學雜誌的創辦人或是一個作家，而是一個政治家，十分重視思想，以思想的價值來衡量文藝的價值，更企圖以「文藝」為宣傳，達到對社會理想的目標。被中共擊敗的教訓及陰影，在穆中南身上都換化成一股「以文藝來反攻」、「以文藝當槍桿」、「以文藝來團結」的戰鬥氣息。

穆中南在五〇、六〇年代，在其主持的《文壇》雜誌上，與當時國民黨的文藝運動、政策宣傳配合無間，甚至有推波助瀾的作用。這樣的表現致使許多人都以為《文壇》為官辦或黨營的刊物，免不了有些猜測或閒言閒語傳到穆中南耳中。他曾在1969年4月106期《文壇》的「每期的話」發表〈再談本刊的態度〉一文：「我反對我們傳統的士大夫思想，一切仰賴國家給養才能替國家做事的看法。我平生所值得驕傲之處，就是自力更生而做著愛國的工作。說本刊是黨營的，也有說本刊是政府辦的，多年來，我們都置之不理……。我們不怕別人加予本刊什麼色彩，本刊按期出版，所有的內容就是它本來的面目和真正的色彩。」

對穆中南來說，在自己創辦的《文壇》上，發抒自己的想法，配合黨國所提的文藝政策，盡一分力量，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

◆ 穆中南的編輯理念與出版實踐

《文壇》創刊於1952年6月，沒有發刊辭，只想「拿貨色給讀者看」，所以連創刊詞都不想浪費紙張。創刊號共登六篇小說：琦君、魚貝、公孫嫵、楊念慈、王藍、陳紀滢；散文四篇：謝冰瑩、艾雯、劉枋、季薇；詩七首：紀弦、上官予、李莎、鍾雷、彭邦楨、蓉子、覃子豪，可說是一時之選。

1954年《文壇》響應「文化清潔運動」，1955年響應「戰鬥文藝」，連續五期刊載三十餘位作家對「戰鬥文藝」的意見，同年10月，文壇更配合出版一套十冊的「戰鬥文藝叢書」，簡直是徹徹底底的「戰鬥文藝年」。這些成果穆中南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搞戰鬥文藝搞垮了，把地賣了，把房子也賣了。」加上1956年6月，穆中南受託到「中國文藝協會」任總幹事，「顧了公家的事，顧不了自己的工作」，文協自己也要發行一份四開報紙型的刊物，工作繁重，要同時維持《文壇》的工作就有點吃力，在「辦不下去，迫不得已」的情況下，忍痛停刊。

但是要悄悄地停刊實在不甘心，穆中南找來了朱嘯秋，兩人合作，決定要把最後一期編得「即使在大陸時期



· 1952年6月，《文壇》創刊號

也沒有的厚大純文藝刊物」，然後再「光榮撤退」。他們不計成本的盡情發揮，終於 1957 年 2 月出版了共 190 頁的《文壇》特大號。內容包括 9 篇評論、24 篇小說、16 篇散文、1 篇電影劇本。穆中南在首頁寫了篇〈文壇五年〉，宣布停刊。

沒想到這一期的《文壇》卻得到海內外一片叫好及惋惜，首版三千本不久就銷售一空。由於出人意外的熱烈反應，給穆中南很大的啓示：只要刊物編得夠水準，不怕沒有讀者。使他對編輯厚重的文學刊物，有繼續辦下去的勇氣及信心。

經過 10 個月的準備，1957 年 11 月出版了第 1 號的《文壇》季刊，內容包括 7 篇評論，25 篇小說，8 篇散文，13 首詩，一個長篇小說，總計 160 頁，份量相當於當時一般刊物的五、六倍，成本負擔相當高。當時名為季刊，事實上穆中南打算出不定期刊物，「好稿子夠了就出一期，有了錢經得起賠就出一期。」這樣的經營方式，著實教人捏把冷汗，但卻奠定日後《文壇》內容的典型。

1964 年開始，每期的頁數由原先 120 頁增加到 160 至 180 頁，每期的字數由 30 萬增加到 40 萬字不等，平均每年刊登 400 - 500 萬字的作品，自改為月刊後，平均有一萬份左右的銷量。這樣的成長當然和日後同時經營「文壇函授學校」和「軍中文藝函授班」有相輔相成的效用，穆中南是如何將文學的理想化做編輯的理念執行出來，同時還能持續 27 年之久？

以下筆者將穆中南編輯《文壇》的理念及特色分項論述。

（一）打破篇幅文長的限制，鼓勵小說創作

自 1957 年元月停刊特大號出版後引起的熱烈回響，使穆中南深信「厚重」的文學刊物，只要內容精彩，還是有相當多的讀者欣賞。自此後，打破文長，尤其是小說篇幅的限制，是《文壇》編輯上的一大特色。

1970 年一整年中，邀請了 20 幾位小說家為《文壇》撰寫長篇小說。1971 年 8 月 134 期，林海音八萬字的小說〈春風〉一次刊完。此外，楊念慈、尼洛、郭嗣汾、司馬中原、王璞、盧克彰、張放、趙滋蕃、吳東權、鍾肇政等那個年代知名的作家的長篇小說都曾在《文壇》上刊載，一期刊個 10 萬到 15 萬字是稀鬆平常的事，長篇 30 萬字分兩期最多三期就登完了。

穆中南這樣的大手筆，也帶動了那個時期的小說創作。他不只在一次的編後記中提醒自己，要注意散文及詩別的文類的創作情形。但說歸說，《文壇》還是大量的登載小說，短篇、中篇、長篇，每種都來，1961 年到 1971 年，持續十年間，每期維持 3 至 4 個長篇，1 至 2 個中篇，15 至 25 篇的短篇小說。累積下來的量十分驚人。

不只一次，穆中南在〈編後〉文中這樣說：「這一期我們推出 24 個短篇小說，而且好幾篇



· 1957年11月，《文壇》捲土重來，出版第1號《文壇》季刊



都在一萬字以上」、「在大篇幅介紹長篇與中篇之下，我們仍然推出了十四個短篇小說，而且有數篇都在二萬字以上。」為慶祝《文壇》創刊十週年，穆中南特以「十萬元大徵文」來吸引好的作品，徵文的項目也以小說為唯一文類，只是分「長篇小說」、「中篇小說」、「短篇小說」三類而已。可見《文壇》長期重視小說的程度。

（二）重視新人新作的發掘與提攜

儘管知名作家大多會在《文壇》出現，但不少新人的第一篇作品，或起頭的幾篇作品是在《文壇》上發表的。穆中南重視新作家的作品，為了確實達到「發現新作家為職志」，穆中南對於新人的作品，較老作家的作品更為嚴格，第一，得超出老作家的水準才採用，第二、雖在水準之上而不夠精彩之作品，看起來沒有很大的前途、題材不新穎的也不採用。在堅持這樣的原則下，也使穆中南嚐盡了一個編輯人讀稿的苦果。在《文壇》極盛的十年（1961 - 1971），平均每期用稿 35 萬字，但每期的來稿多至 500 萬 - 600 萬字，穆中南親自選稿，必須閱讀每一篇稿，認真、持續地從其中發掘好的作品，以及有潛力的作者。今日我們回頭整理五〇、六〇年代的創出版品時，曾驚訝發現長篇小說或小說的量，遠超過其他文類，《文壇》在那個年代所發揮的影響力，應該有絕對的功效。

（三）重視不同階段讀者的意見

身為一個雜誌的發行人、主編，負責整個雜誌的經營與編務，還能經常性地與幾十個不同階層的讀者保持聯繫，放在今日的媒體行銷概念都是先進的，何況在當時資訊科技並不發達，每封信都要手寫、裝信封、郵寄等動作。穆中南時時徵詢讀者意見，做為改進的參考。

穆中南除了定期與三、四十位各個不同階層的讀者保持聯繫外，每個月經常要閱讀整理讀者的信件三、四百封，需要回信的，必親自回覆。1961 年 12 月，《文壇》第 18 期，舉辦了向讀者「徵詢意見」的工作，參加通訊活動的有 3440 封，得到 820 人的回信。歸納起來總共有 206 個不同的問題，穆中南也在 1962 年 3 月的 21 期上，以一篇〈向讀者報告——為歸納徵詢意見而寫〉文章，分別回答各項問題。

以讀者為尊，以作品為貴，穆中南確實地執行他的編輯理念，也讓《文壇》的發行及銷售蒸蒸日上。

（四）「本省籍作家作品選集」出版

國民政府來臺後的前十年，全面推行國語，並統一文字的使用，短時間內即廢止各大媒體的日文版面。這對長時間受日本殖民統治的省籍知識份子及文人來說，無疑是束手縛腳的重大打擊。他們學習國語、複習漢文，努力嚐試用中文發表文章，一吐他們的心聲，表達他們想法，也希望能在各個文藝媒體上嶄露頭角。

鍾肇政在當時算是較早較快能掌握中文創作的省籍青年之一。他開始用中文創作後的多年，才在《文壇》月刊上發表文章。但從一開始，穆中南就十分重視這位省籍青年。1964 年 2 月第 44 期的《文壇》，穆中南在〈編後〉就預告了下期即將刊出鍾肇政的長篇小說《大壩》，並謂「這是一篇很難得很深刻的作品。」接著《大壩》正式登場，穆中南又在〈編後〉特別推

荐：「本刊一次推出六萬餘字，作者表現上的技巧是值得欽敬的，希望讀者多珍視。」《大壩》連載完的最後一期，又預告「他將有更堅實的作品生產」。同年5月，《大壩》由「文壇社」印行出版，5月23日，鍾肇政寫信給穆中南，雖然沒有註明寫信的內容，照後續的發展推測，應該是鍾肇政向穆中南談及出版「戰後臺灣作家選集」的事。8月，穆中南回信給鍾肇政，願意全力支持「臺灣作家叢書」的出版計畫。9月，文壇51期的〈編後〉，穆中南再度以三百多字慎重的推介「本省籍青年作家鍾肇政的另一個最成功的長篇小說《流雲》」，並開始連載，一連5期，至1965年2月刊畢。1965年10月，臺灣光復二十周年紀念，「文壇社」推出一套十冊的「本省籍作家作品選集」，由省籍作家鍾肇政主編。

心中始終想為省籍作家編選集的鍾肇政，得到穆中南的支持，鍾肇政得以加快腳步，開始省籍作家作品的編輯工作，《文壇》也在1965年2月的月刊上持續刊載「新人小說集」、「新詩集」的徵稿啓事。1965年10月，臺灣光復20周年，一套十冊，設計精美大方，平均頁數230-496頁不等，32開，《本省籍作家作品選集》堂堂推出。

本套叢書共收168位作家作品，編輯也頗見用心，在每位作家作品前，有一篇介紹人與作品的短文，另外每位作家都有照片及小傳。這是自1949年國民政府遷臺以來最大規模的省籍作家作品的選集，頗具時代意義。

除了「戰鬥文藝叢書」、「本省籍作家作品選集」兩套各具意義及特色的叢書外，在編輯出版《文壇》月刊外，叢書出版也是文壇的主要業務之一。

自《文壇》刊期改為穩定的月刊後，穆中南「文壇每月文叢」的構想產生了。他認為要杜絕市面上魚目混珠、品質內容低劣也敢美其名叫文藝叢書的最好方法，莫過於出版純真的文藝書籍，而且定價要比那些以漁利為目的之書商更便宜。於是，第一批二十本的「每月文叢」推出，採低價策略，100頁的書，每本定價3元，比同時期的書，便宜一半以上。但是這樣的低價策略，並沒有成功，許多書的銷路並不好，在不能「薄利多銷」的現實考驗下，許多叢書就自動絕版了，雖然穆中南說《文壇》總計出版156種叢書，可是在《文壇》最後幾年，經常性地刊登在雜誌內的叢書廣告，大約只有60幾種。

1955年穆中南出版一套十本的「戰鬥文藝叢書」，相隔十年，又出版一套十本的「本省籍作家作品選集」，這兩套截然不同旨意、不同對象的叢書，顯現出穆中南在不同時代氛圍下不同的文學出版思維。

◆ 穆中南「文壇函授學校」的文學教育理念與實踐

如果說穆中南在五〇年代的文學傳播有其特殊的貢獻，那麼他所創辦的「文壇函授學校」絕對是其中的關鍵。

五〇、六〇年代產生不少優秀的軍中作家，這和國民黨對軍中文藝工作的推行有絕大的關係。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自1953年起即開始每年舉辦軍中徵文，穆中南經常受邀擔任評審工作。1955年，國防部委託李辰冬創辦的「中華文藝函授學校」代辦「軍中文藝函授班」，連續舉辦了兩屆。後來李辰冬因故離開中華文藝函授學校，辭去軍中文藝班班主任一職。1957年的某一天，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透過朱嘯秋問穆中南願不願接辦軍中文藝函授班；穆中南考慮後



答應了，於是開始積極籌備。1958年元旦，「文壇函授學校」成立，同時軍中文藝函授班第三屆開班。

軍中文藝函授班是透過國防部名義向軍中招生，每屆學生五千到七千人不等，穆中南共辦了8屆，參加的近三萬人，穆中南認為軍中文藝函授班最大的貢獻在於：「參加本校的人在精神上都有了寄托，並且以這種安定力來影響他的伙伴，對於逛茶室、鬧情緒之類的事情減少，因為他們受到文藝的培養，有了高尚、自尊的品格和修養，對於人生有了新的希望。如果具體一點說，參加本班三萬多官兵，起碼有一半以上在第一次通信中，其文字有如天文，但半年或一年下來，即能寫封很通順的信，可以給長官寫篇報告，可以很省力的讀書報，這樣的人有一萬二三千人之多。」

1960年，總政治部因經辦人的關係突然停辦了軍中文藝函授班的業務。但文壇函授學校卻很穩定的經營下去。當年閱讀過《文壇》的人，應該都記得在封底、封面裡，或封底裡的「文壇函授學校擴大招生」的廣告字樣。起初班別分新聞班、小說班、文學班、國文進修班、國文先修班、綜合班，入學資格是「凡文字通順之失學青年，及對文藝寫作、新聞業務或對國文有志進修之青年」、「綜合班須具有高中畢業或同等學力者。」各班修業期間定為半年，綜合班為一年，期滿及格者，由文壇函授學校頒發結業證書。

為了鼓勵愛好寫作的年輕朋友，穆中南在函授通訊上告訴他們，《文壇》每期都由函授學校同學中選出最好的佳作，和名作家的作品同時發表。當今知名學者鄭明嫻教授在師大讀書時就曾參加文壇函授學校。習作的第一篇散文和第一篇小說都被登在《純文學》月刊，後來又分別被收入《純文學散文選》、《純文學好小說選》。隨後，鄭明嫻陸續在《文壇》上開始了她的散文評論及書評。

七〇年代之後，社會逐漸由農業社會轉型為工業社會，資訊科技電子媒體的傳播日益興盛，報紙雜誌、圖書，以及廣播、電視媒體也愈來愈多，資訊的取得日益容易，經濟的改善使受教育的機會提升，文藝函授學校的方式不再是提供文藝知識的唯一的管道，它獨特的「函授」形式，也逐漸不能滿足文藝愛好者，於是文藝函授學校在七〇年代後期就日趨沒落了。

◆ 《文壇》的興盛與衰頹

生於民國元年的穆中南，1952年6月《文壇》創刊時他甫邁向中年，滿腔熱情，體力智慧也正值巔峰。1958年元月穆中南成立「文壇函授學校」開始的七年間（1958 - 1965），為《文壇》的黃金歲月，發行最大時高達兩萬一千份。但也因《文壇》及軍中文藝函授班與文壇函授學校均採低價策略，學生人數驟增，增加講義費的收入，並不能抵消請人短時間內批改作業的費用。一些朋友看到《文壇》不斷增加篇幅、厚度，雖然看得過癮，但總為他擔心成本的負擔，穆中南卻「把增加銷路的節餘用在增加篇幅和改進內容上」。

在《文壇》創刊十週年的一篇文章中，穆中南除了將《文壇》這十年所做的重要工作概述一遍外，在最後一段「今後的努力」中他說：「我已決心把《文壇》作為終生的事業，以我的體力，我準備經營《文壇》三十年，已過了十年，還有二十年漫長路待我去開闢」。除了對未來的期待，穆中南還把日後工作的重點一一列出，充滿了雄心壯志。但大量的工作終於使穆中

南的身體負荷不了了，1961年5月6日他病倒了，在病中仍未中斷工作。一直到1964年，《文壇》仍然一直維持一萬份以上的銷量。但曾信誓旦旦，準備與《文壇》奮鬥30年的穆中南，在《文壇》滿十四週年時，已無復當日的豪情。「記得我曾立願維持本刊三十年，盡到在這一代的文學使命，我們已走了將近一半的路程，心身確已感到疲累。我後悔當初誇下這一海口，應下這個諾言。請想：人生有幾多三十年呢？尤其在這個時代，維持這樣份量重的刊物，實非一個平凡者力所能及，而我是個平凡中的一個平凡人。」

自此開始，從穆中南每逢週年在《文壇》上撰寫的回顧與檢討，都感覺到他的疲累與無奈，文字中透露出無法承受之「重」。工作的重擔，《文壇》日漸虧損、下滑的經營狀況，妻子的病故，當年創刊的熱情及信心，已被現實的環境逐漸侵蝕。

《文壇》創刊初期，尚無同類型大型文學雜誌，1954年《皇冠》雜誌創刊，內容偏向綜合藝文性，較《文壇》更為大眾化，兩刊路線尚未完全重疊；六〇年代，以文學創作、評論為主的《作品》（1960）、《現代文學》（1960）創刊，以軍中文藝軍中作家為主的《新文藝》（1962）創刊，以大眾小說為主的《小說創作》（1962）創刊，強調本土性的《台灣文藝》（1964）創刊，《純文學月刊》（1968）、《文藝月刊》（1968）也接著創刊，再加上各類詩刊，《劇場》（1965）、《大學雜誌》（1968）等，一時之間，百花齊放，各類型的雜誌可以滿足不同需求的人，此時整個社會教育及經濟水準逐漸提昇，雜誌已逐漸邁向分眾市場，此時《文壇》的市場獨佔性不再，銷售難免逐漸下滑。

六〇年代末期，當各類文學雜誌逐漸擁有自己的內容特色及讀者群時，相較之下《文壇》反而顯得面貌模糊。加上長久以來，《文壇》的文章構成有三分之一以上是函授學校學生的實習稿，或是從作業中挑選出來的，水準當然不及已經成名的作家。其次，《文壇》較《皇冠》及其他報紙、雜誌較低的稿費，也是已成名作家不願意再為其撰稿的因素之一。內容的大眾通俗，不如《皇冠》、《小說創作》，文學性的品質又不如《純文學》、《台灣文藝》、《文藝月刊》等，《文壇》自此走上了衰頹之路。

1971年5月30日至6月1日，連續三天在臺北市中華路的國軍文藝活動中心二樓，《文壇》舉辦一個特別的展覽，除了展出所有的出版品、作家原稿外，並用畫及圖展示近二十年來《文壇》推動文藝的經過。穆中南同時在同年6月的雜誌上，宣示〈從一個新點上起步〉，為尋找出路決心改組。方法是先徵求社員，將來由社員產生執掌社務的推動。然因誘因不大，效果不彰。1973年4月《文壇》除了保持過去創作詩、散文、小說的風格外，特闢「作家介紹」、「書摘」、「書評」、「生活小品」、「臥遊寰宇」、「人物誌」等專欄，企圖改變尋找新出路的用心昭然可見，可惜此時《文壇》似乎已欲振乏力，難再回到五〇年代風光的日子。

穆中南的體力及財力，在《文壇》步入20週年後，也到了一個臨界點。在面對各種壓力下，他萌生退場的打算，在《文壇》上公開表明態度，希望能尋找「接班人」或單位。

1976年12月21日，行政院新聞局首屆優良雜誌金鼎獎頒給了21家雜誌，《文壇》是其中唯一的純文藝刊物；1977年元月《文壇》再度榮獲國家文藝基金會第一屆全國優良雜誌優等獎。連續得到兩個優良雜誌獎，對穆中南來說，不無鼓舞，不無安慰。他決心再努力一年，作最後的衝刺，再交給年輕的一代接棒。



1978年元月，穆中南在《文壇》211期上發表了一篇〈告別矣！「文壇」〉，字字血淚，令人動容，全文交待創辦《文壇》的宗旨，交待《文壇》曾做了什麼事，現在因病（中風）需要休養，自212期開始他交棒給曾經合作過的老友朱嘯秋，最後他說：「我雖告別了《文壇》，但我未別文壇，而仍然在圓跡上運行，等身體養正常些，學識自修成熟些，我仍然要為文壇而服務。我急流湧退，把《文壇》有個妥善的安排，把文壇叢書廉價賣出，把房子押出，債務還清，使我有時間作良好的準備，有始有終不是很美滿嗎？」

事實上，穆中南因中風住院，右眼失明，病情已十分嚴重。在體力、心力俱疲下，穆中南不得不結束《文壇》的事務。總計他從創刊到出手轉讓，總計26年7個月。1978年2月，朱嘯秋接手《文壇》後，改變其原本的純文藝性質，擴大為知識性、生活性、藝術性。沒多久，函授學校也停止了，《文壇》缺少了廣大的基本訂戶。1985年11月302期，朱嘯秋因故離開臺灣，創辦33年的《文壇》也就消聲匿跡了。

◆ 結論

《文壇》總計跨越了五〇、六〇、七〇、八〇四個年代，承載了文學發展中的豐美成果，也見證了不同年代文學社群的起落興衰。

穆中南在資源匱乏的五〇年代初期，憑著一己之力及對文學的熱情，創辦了《文壇》雜誌，為當時的文學創作者、文學欣賞者提供了一個寬闊的園地。雖然因其個人的成長背景及思想，使其服膺國民黨「倡導文藝政策」、「統一文藝陣線」、「用戰鬥文藝來救國」的政策，主動在雜誌上配合並為其宣傳。然而這些應不至抹殺穆中南與《文壇》雜誌對臺灣文學傳播的影響及貢獻。

《文壇》以其質樸、厚實的樣貌，妝點了五〇年代的文學雜誌，成為其中耀眼的晨星。當時報章雜誌談文論藝的文章，多為短文、小品或補白之作，《文壇》不限文長，提供園地，鼓勵作家、有潛力的新人，創作長篇、中篇、短篇小說，對臺灣當代小說的推展，有實質的提昇及貢獻。

除作家、編者、文學媒體負責人的身分外，穆中南還是一個文學教育家。他創辦文壇函授學校，承接軍中文藝函授班，提供近十萬喜愛文藝的社會大眾方便學習的機會，也普及了文學教育。此外，不論其經營的《文壇》雜誌、文壇叢書，或函授學校，均採低價策略，讓文學教育或出版品因之更加普及化。

掃瞄光復以來的臺灣文學雜誌，不屬公營、黨營或機關、學校、財團，以私人之力經營從未易主，且面對市場、持續出版達27年之久，穆中南的《文壇》雜誌，其韌性及生命力，目前仍然無人能及，我們理應對他表示敬意。